

列 宁 怎 么 办 ?

第 四 分 册

人 民 出 版 社

В. И. ЛЕНИН
ЧТО ДЕЛАТЬ ?
Наболевшие вопросы нашего движения

本书译文采自《列宁全集》中文版第5卷，这次排印
第二版时，由译者根据原文重新作了一次校订。

列 宁
怎 么 办 ?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大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根据 1965 年 3 月第 2 版重排
1971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书号 1001 · 605 每部(四册) 1.20 元

目 录

序言	3
一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7
(一) 什么是“批评自由”?	7
(二) “批评自由”的新拥护者	12
(三) 俄国的批评派	18
(四) 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	27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35
(一) 自发高潮的开始	36
(二) 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	41
(三) “自我解放社”和“工人事业”杂志	53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67
(一) 政治鼓动以及经济派缩小政治鼓动的观点	68
(二) 马尔丁诺夫究竟怎样加深了普列汉诺夫的意见	81
(三) 政治的揭露和“培养革命积极性”	85
(四) 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	92
(五) 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	96
(六) 又是“诽谤者”，又是“捏造者”	116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121

(一) 什么是手工业方式?	122
(二) 手工业方式和經濟主义	126
(三) 工人的組織和革命家的組織	135
(四) 組織工作的規模	155
(五) “阴谋”組織和“民主制”	163
(六) 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	173
五 全俄政治报“計劃”	187
(一) 誰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了气?	188
(二) 报紙能不能成为集体的組織者?	195
(三) 我們需要什么样式的組織?	210
結束語	219
附录 “火星报”同“工人事业”杂志实行統一的 嘗試	223
对“怎么办?”一书的一个更正	233
注释	235

五

全俄政治报“計劃”

波·克里切夫斯基責備我們有“使理論脫离实践而把它变为死的教条”的傾向，他写道(“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30頁)：“‘火星报’在这方面的最大錯誤就是它那个全党組織的‘計劃’”(即“从何着手?”一文^①)。馬尔丁諾夫也附和他說：“‘火星报’有輕視日常的平凡的斗争进程而偏重于宣传光輝的完备的思想的傾向……結果就在第4号上所載的‘从何着手?’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全党組織計劃”(同上,第61頁)。最后,尔·納杰日丁近来也出来响应对这个“計劃”(引号想必是表示对这个計劃的諷刺)表示憤懣的人們。我們刚收到他所著的“革命前夜”一书(这本书是我们已說过的那个“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出版的),其中說道：“现在來談什么以全俄報紙为中心的組織，就是培植脱离实际的思想和脱离实际的工作”(第126頁)，就是“文人习气”的表现等等。

我們的恐怖主义者和“日常的平凡的斗争进程”的拥护者志同道合，——这并不使我們感到奇怪，因为我們在

^① 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1—10頁。——編者注

前面談到政治和談到組織的那两章里已經考察过他們这种互相接近的根源。但我們也应当立刻指出：尔·納杰日丁，并且只有他一个人，打算誠心誠意地来研究一下他所不喜欢的这篇文章的內容，打算从实质上回答这篇文章，——而“工人事业”杂志却没有从实质上讲过任何一句話，只是极力用一大堆无聊的蠱惑人心的胡言乱語来模糊問題。于是，无论我們怎样不乐意，也不得不費些時間来首先打扫一下这个奧吉亚斯的牛圈^①。

(一) 誰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了气？

讓我們把“工人事业”杂志用来攻击我們的那一大堆字眼和感叹詞句摘录一下吧。“并不是報紙能够建立党的組織，而是相反……”“一个站在党的上面、不受党的监督、因拥有自己的代办員网而离开党独立存在的報紙……”“为什么‘火星报’居然忘記了它自己所属的那个党内实际存在的社会民主党人組織呢？……”“拥有固定的原则和相应的計劃的那些人，同时也就是全党的实际斗争的最高支配者，他們可以命令全党去执行他們的計劃……”“这一計劃把我們的生动的和富有生命力的組織都赶入阴間，而想把一个幻想性的代办員网呼喚到人世上来……”“‘火星报’的計劃如果得到实现，結果就会連我

^① 希腊神話中說，奧吉亚斯的牛圈三十年來沒有打扫，后来被海格立斯在一日內扫清。意思是指极肮脏、极污臭的地方。——譯者注

們这个已在形成起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痕迹都扫除淨尽……”“一个宣传性的机关报成为全部实际革命斗争中不受监督的、专制的立法机关……”“我們的党对于强迫它完全服从一个自主的編輯部这一点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如此等等。

讀者从上述这些引文的內容和口气中可以看出，“工人事业”杂志是生气了。但它之所以生气，并不是为自己抱不平，而是为我們党的那些組織和委員会抱不平，因为據說“火星报”想把它們赶入阴間，甚至想連它們的痕迹都扫除干淨。你想，多可怕呀！不过，有一点是很奇怪的。“从何着手？”一文发表于1901年5月，“工人事业”杂志上的那些論文发表于1901年9月，而现在已經是1902年1月中了。在这五个月里（无论是在9月以前或在9月以后），党内既沒有一个委員会，也沒有一个組織提出过正式抗議来反对这个想把各个委員会和各个組織都赶入阴間的恶魔！同时，在这期間，无论是在“火星报”上，也无论是在許多其他的地方出版物或非地方出版物上，都又发表了几十篇几百篇从俄国四面八方寄来的通訊。为什么人家想把他們赶入阴間的那些人居然沒有觉察到这一点，沒有因此生气，——而生气的却是第三者呢？

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各个委員会以及其他組織都在进行真正的事业，而沒有玩什么“民主制”的儿戏。各个委員会都讀过了“从何着手？”一文，都认为这是想“制定

出一个相当的建立組織的計劃，以便能够从各方面着手建立組織”的一种尝试，同时它们都很清楚地知道和看到，“各方面”中的任何一方面在沒有相信这个建筑的必要和建筑計劃的正确以前，是不会想到要“着手建立”的，所以它们也就自然沒有想到要因为有人在“火星报”上擅敢說出下面的話而“生气”：“鉴于問題的迫切重要性，我們想給同志們提出一个計劃草案来考虑，关于这个計劃，我們在准备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将作詳細的發揮。”如果同志們采納这个提供他們考慮的計劃，那末他們执行这个計劃就不是由于“被迫服从”，而是由于相信它是我們的共同事业所必需的；如果他們不采納这个計劃，那末这个“草案”（这是个多么狂妄的字眼啊！）就会始終不过是个草案，——难道这不是每个誠恳地对待問題的人都很容易了解的事情嗎？如果在攻击一个計劃草案时不只是“譴責”这个計劃并劝同志們拒絕这个計劃，甚至唆使那些对于革命工作很少有經驗的人去攻击計劃起草人，而所以实行攻击，又只是因为这些起草人擅敢“立法”，擅敢充当“最高支配者”，即擅敢提出一个計劃草案，——难道这不是一种蠱惑人心的手段嗎？？如果人們对于那种想把地方活動家提高到更廣闊的見解、任务、計劃等等的水平上来的企图提出反駁，并不只是由于自己认为这种見解不正确，而且還由于有人“想”把我們“提高”一步而感到委屈，——試問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們党能够发

展，能够前进嗎？爾·納杰日丁也曾經“譴責”過我們的計劃，然而他並沒有使用不能單用政治見解的幼稚或粗淺來解釋的蠱惑手段，他從一開始就堅決排斥了所謂“監督全黨”這種罪名。因此談到納杰日丁對於計劃所作的批評時，我們可以並且應當從實質上給以回答，而談到“工人事業”雜誌所提出的批評時，我們却只能以鄙視作為回答。

雖然我們對於一個墮落到叫喊什麼“專制”和“被迫服從”的作家應當表示鄙視，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因此就不必去澄清這種人提供給讀者的糊塗觀念了。只有澄清這種糊塗觀念，我們才能使大家明白認識，這種空談“廣泛民主制”的时髦詞句究竟是怎樣一種貨色。有人責備我們，說我們忽略了各個委員會，說我們要想或企圖把它們趕入陰間等等。既然我們迫於目前秘密工作的條件几乎任何一件涉及我們同各個委員會之間的真實關係的事實都不能向讀者說明，試問我們怎麼來回答這種責難呢？那些信口提出一種刻薄的、能夠刺激群眾的責備的人，居然走到我們前面去，這只是因為他們無所顧忌，因為他們根本輕視革命者必須把自己所擁有、所建立或力圖建立的一切關係和一切聯繫都仔細地隱蔽起來的責任。所以，我們也就根本拒絕在“民主制”方面去同這班人競爭。至於說到那些對黨內的一切事務都不熟悉的讀者，那末我們執行我們對這種讀者的義務的唯一辦法，就不是敘述

现有的情形和处于 *im Werden*^① 的情形，而是叙述一小部分已經过去、因而可以当做已往的事实来叙述的情形。

崩得暗指我們“擅自称王称霸”^②，国外“联合会”責备我們企图連党的痕迹都扫除干淨。好吧，諸位先生。我們只要向讀者叙述一下已經过去的四件事实，就能使你們心滿意足了。

第一件^③ 事实。一个“斗争协会”中的直接参加过我們党的成立以及直接参加过派代表出席党的成立大会的几位會員，曾經同“火星报社”的一个成員商定，要出版一套适应全部运动需要的工人丛书。出版工人丛书的計劃沒有实现，但是为这套丛书而写的两本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和“新工厂法”^④ 却几經轉折由第三者带到国外去出版了⁴¹。

第二件事实。崩得中央委員会的几个委員向“火星报社”的一个成員建議共同成立一个像崩得当时所說的“著作實驗所”。同时他們还說，假如这件事情办不到，那末我們的运动就会大大退步。談判的結果是写出了“俄

① 生长过程中。——編者注

② “火星报”第8号上俄波犹太工人总联盟中央委員会对我們論民族問題一文的答辯。

③ 我們故意把这些事实列举得与它們实际发生的次序不一样⁴⁰。

④ 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279—302頁和第228—271頁。——編者注

国工人的事业”这本小册子^①。

第三件事实。崩得中央委员会通过一个外省市鎮組織来向“火星报社”的一个成員接洽，說要請他負責編輯准备复刊的“工人报”，結果当然是获得了同意。后来这一建議有所改变，改成了請他撰稿，因为关于編輯人員的問題又有了新的安排。这一提議当然也获得了同意^②。接着就寄去了以下几篇論文（这几篇論文的稿子保存下来了）：“我們的綱領”——內容是直言不諱地声討伯恩施坦主义，反对合法刊物及“工人思想报”上所表现的轉变；“我們的当前任务”（要“創办一个正常出版而与一切地方团体密切联系的全党机关报”；揭露目前盛行的“手工业方式”的弊病）；“迫切的問題”（批判认为在着手出版共同机关报以前必須先发展各个地方团体的工作这种反駁意见；坚决认定“革命組織”有头等重要意义，认为必須“使組織、紀律和秘密活動技术达到最完善的地步”）^②。“工人报”复刊計劃沒有实现，于是这几篇論文也就沒有发表。

第四件事实。一个委員会中的一个負責筹备我們党

① 順便說說，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托我代他声明一句，說他这本小册子的手稿也像他先前所写的几本小册子的手稿一样是寄交“联合会”的，因为他以为“联合会”的出版物仍由“劳动解放社”編校（由于某些条件，他在当时，即在1899年2月間還不能知道編輯人員变更的事实）。这本小册子很快就会由同盟負責重版。

② 见“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186—190、191—195頁和第196—200頁。——編者注

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員，把大会的會議計劃通知“火星報社”的一個成員，并推举該社為預備復刊的“工人報”的編輯候选人。他采取的这个所謂預備步驟，隨后又經他本人所屬的那个委員會以及崩得中央委員會正式批准⁴³；“火星報社”接到了關於大会召集地点和日期的通知，但它恐怕由於某些原因不能派遣代表去參加这次大会，于是就也写了一个提交大会的书面報告。在这个報告里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在目前这个十分混乱的时候，我們单只选出一个中央委員會不仅不能解决統一問題，并且可能会动摇建黨这种伟大的思想，因为在目前不守秘密的现象十分流行的情况下一定很快又会全部遭到破获；所以，第一步工作应当是号召一切委員會及其他一切組織來支持恢复起来的共同的机关报，这个机关报將用**实际的**联系把所有的委員會**真正**联成一气，并**真正**培养出一个領導全部运动的領導者集團，而当这样一个由各委員會所培养的集團充分成长和巩固起来的时候，各委員會和党就能很容易把它变成为中央委員會了。可是，代表大会因为有几次破获事件发生而沒有召集成功，这个報告也由於必須保守秘密而被銷毀了，讀到这个報告的只有很少几位同志，包括一个委員會所派出的几位全权代表在內。

現在請讀者自己來判斷一下，像崩得暗指我們擅自稱王稱霸，或者“工人事業”杂志硬說我們想把各个委員會趕入阴間，想用传播一个報紙的思想的組織來“代替”

全党的組織这样一些手段，究竟是怎样一种手段吧。其实，我們向各个委員會作報告，說必須採取一定的共同工作計劃，这正是**按照各个委員會再三提出的請求**。我們在寄給“工人報”發表的文章以及提交黨代表大會的報告中發揮這個計劃，正是為了全党的組織，并且我們这样做，也是根據那些在黨內如此有影響的，即擔負着倡導恢復（事實上恢復）我們黨的責任的人們提出的請求。只是在黨組織**和我們一同來正式**恢復党中央機關報的兩次嘗試都遭到失敗以後，我們才認為自己真正有責任創辦一個**非正式**的機關報，使得同志們在作第三次嘗試時有相當的**實驗**結果可以參考，而不只是凭空猜測。現在這一實驗所提供的某些結果已經是有目共睹了，所以現在全体同志都能判斷我們對我們應盡的責任了解得究竟是不是正確，都能判斷那些因為我們指出他們當中有些人在“民族”問題上的不徹底以及另外一些人產生不可容忍的無原則的動搖而對我們懷恨在心，因而企圖把一些不了解不久以前的情形的人引入迷途的那些人究竟是些什么人了。

（二）報紙能不能成為集體的組織者？

“从何着手？”一文的全部要点，就在于提出這個問題並且給以肯定的回答。我們知道，只有爾·納杰日丁一個人曾經企圖從实质上分析這個問題，並企圖證明必須給以否定的回答。我們現在把他的論據全部引錄如下：

“……我們很喜歡‘火星報’（第4號）提出必須創辦全俄報紙的問題，但我們絕對不能同意說這種提法與‘從何着手？’一文的標題是適合的。這當然是一種極重要的工作，但是能奠定革命時期的战斗組織的基礎的並不是這種工作，並不是一大批通俗傳單，並不是一大堆宣言。必須在各地着手建立強有力的政治組織。我們還沒有這種組織，我們過去主要是在有知識的工人中間進行工作，而群眾差不多只是進行了經濟鬥爭。如果不在各地培植起強有力的政治組織，那末即使有辦得很好的全俄報紙，又有什么意思呢？自焚樹老是在那裡燒着，總燒不完，但是它也燒不着任何人！‘火星報’以為人民一定會在全俄報紙的周圍，在建立全俄報紙的事業上集合起來，組織起來。其實，人民在更具體的事業的周圍是會更親切得多地集合和組織起來的！可以而且應當成為這種事業的，就是普遍創辦地方報紙，立刻準備工人力量去作威游行，由地方組織在失業工人中間經常進行工作（經常在他們中間散發傳單，召集他們開會，号召他們反抗政府，等等）。我們要在各地着手進行生動的政治工作，而當在這個實際的基礎上的統一成為必要的時候，那它就不是什麼人為的統一，不是紙上的統一了。這樣把各地方的工作統一成為全俄的事業的任務，決不是報紙可以辦到的！”（“革命前夜”第54頁）。

我們在這一大段雄辯的議論中加了着重號的那些字句，最突出地表明了該文作者無論對我們的計劃的估計，或者他在此拿來與“火星報”對立的一般觀點，都是不正確的。如果不在各地培植起強有力的政治組織，那末有辦得極好的全俄報紙也沒有什麼意思。——這話完全

正确。但問題就在于除了利用全俄報紙之外，**再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組織。作者忽略了“火星報”在說明它的“計劃”以前所做的那個極重要的聲明：必須“号召建立革命組織，使它**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能够統一一切力量，領導运动，即随时都能有准备地支持一切抗議和一切发动**，利用它們來擴大和巩固可供決戰之用的軍事力量”。現在，在二三月事件之後，——“火星報”繼續寫道，——在原則上大家都會同意這一點了，但我們需要的不是在原則上而是在實際上**解决問題**，需要的是立刻提出一個明確的建設計劃，使大家能夠立刻**从各方面着手**進行這種建設。但人們又把我們拉向後退，使我們離開實際解決問題的事情，轉回去空談那個原則上正確的、不容置辯的、偉大的、然而是完全不夠的、為廣大工作人員所完全不能理解的真理：“**培植强有力的政治組織**”！可敬的作者呵，現在問題並不在此，而是在**究竟怎样来培植和培植起这种組織**！

“我們過去主要是在有知識的工人中間進行工作，而群眾差不多只是進行了經濟鬥爭”這個說法，是不正確的。這種說法同“自由”雜志上常見的、把有知識的工人和“群眾”對立起來的那種根本錯誤的觀點倒是一致的。近几年來，我們的有知識的工人也“差不多只是進行了經濟鬥爭”。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不幫助有知識的工人和知識分子**把自己培养成**政治鬥爭的領導者，那

末群众永远也学不会进行政治斗争的；而为了培养出这种领导者，又只有依靠經常和随时估計我国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估計各个阶级由于各种原因而实行反抗和斗争的一切企图才能做得到。所以，一方面說“培植政治組織”，同时又把政治報紙的“紙上的事业”同“各地方的生动的政治工作”对立起来，这是十分可笑的！而“火星报”正是把自己的办报“計劃”引申为造成“战斗准备”的“計劃”，来支持失业工人的运动、农民的騷乱、地方自治派的不滿以及“人民对胡作非为的沙皇暴吏的义憤”等等。凡是熟悉运动的实际情况的人，都清楚地知道：绝大多数地方組織連想也沒有想到过这一点；这里所拟定的这些“生动的政治工作”的任务有許多是任何一个組織都一次还没有实行过的；而当有人例如要大家注意地方自治派知識分子中的不滿和反抗情緒增长的事实时，納杰日丁（他說，“天哪，这个机关报岂不是为地方自治派办的嗎？”——“革命前夜”第 129 頁）、經濟主义者（“火星报”第 12 号上发表的那封来信）以及許多实际工作者都感到困惑莫解。在这种情形下，也就只能这样来“着手”工作，即首先喚起人們想到这一切，喚起人們来归纳和綜合所有一切风潮和积极斗争的表现。现在在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被降低了的条件下，“生动的政治工作”也只能从生动的政治鼓动工作着手，而生动的政治鼓动工作又非有經常出版并且能够很好地进行推銷的全俄報紙不可。

把“火星报”的“計劃”看做是“文人习气”的表现的人，完全不懂得計劃的实质，把提出作为目前最适当的手段的东西当成了目的。这些人沒有用心想一想那两个清楚地說明了这个計劃的比喻。創办全俄政治报，——“火星报”曾經写道，——应当是我们使这个組織（即随时都准备支持一切抗議和一切发动的革命組織）得以不断向深广发展的基本綫索。当石匠建造一座巨大的和前所未见的建筑物而在各个地点放置石头的时候，他总要拉一根綫来測定放置石头的适当位置，指明全盘工作的最終目的，不仅使每一块石头而且使每一小片石头都能得到使用，使它們相互銜接起来，形成一座完整而統一的大廈的輪廓，请問，这算不算是“紙上的”事情呢？目前我們党的生活的状况，岂不正是既有石头，又有石匠，但是缺少一条使大家都能看得见，使大家都可以把握住来进行工作的引綫嗎？讓他們去叫喊，說我們拉一根引綫就是想发号施令吧！先生們，假使我們真想发号施令，那我們就不会标明为“火星报”第1号，而会标明为“工人报”第3号了，——有些同志曾經劝我們这样做，并且我們在上述那些事件发生后本来是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的。但我們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們想使自己的双手不受束縛，以便同一切假社会民主党人作不調和的斗争；我們当时希望，——如果我們的引綫拉得正确的話，——人們尊重这条引綫是因为它拉得正确，而不是因为它是由一个正式的机关